

吴基民 著

中国托派的苦难与奋斗

炼狱

吴基民著

中国托派的苦难与奋斗

炼狱

阅 览



八方文化创作室

中国托派的苦难与奋斗

炼狱

- 作 者 吴基民
企划编辑 潘国驹
责任编辑 何 华
封面设计 何美娇
内页设计/排版 李丽芳
出版/发行 八方文化创作室
5 Toh Tuck Link, Singapore 596224
www.globalpublishing.com.sg
- 联 络 65-64665775 支线 424
chpub@wspc.com
- 印 刷 World Scientific Printers
初 版 2008年4月
国际书号 978-981-4139-96-0
版权所有 © 2008 八方文化创作室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陈思和

关于这部书的意义，在作者的《跋》里全文引录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专家、著名的托洛茨基传记《先知三部曲》的通读审定者郑异凡先生的审读意见里已经讲得十分清楚了，无须我在这里赘言。我不是这一领域的专家，只能以作者吴基民先生的朋友身份，发表自己阅读后的感受。吴基民先生曾经在上海文史馆工作，他有机会得以亲聆许多历尽苦难然而劫后残存、信念不改的老托派分子的讲述，这批人所遭受的磨难，尤其是在1952年12月22日全国“大肃托”以后的遭遇，几乎是一个无人所知的秘密。这些被封尘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重见天日，不是要引起今天对那段历史一无所知的人们发出廉价的感叹，甚至也不是要对这些受难者给出一个迟迟未来的公道。——从实际意义上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现代史上风云际会的托派精英们都已经先后作古，残留在中国大陆苟延残喘的托派分子已经是极少数了，作为一个冤案的平反已经失去了普遍的意义。那么，我们究竟能够从这部书里读出些什么？

目 录

目录

iii 序 陈思和

- 1 一、 斯大林为了援助中国革命而开设的中山大学，想不到却成了滋生中国托洛茨基派的温床
- 19 二、 大喜大悲艰难搏杀的1931年。周恩来、瞿秋白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托派小人物谢澹如。5月1日，来自全国17位托洛茨基的代表，聚集上海，举行了他们的“一大”，这是可以载入史册的……
- 39 三、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陈独秀就是抱着这种殉道者的精神投入到中国托派的统一之中。但很少有人领他的情……
- 45 四、 彭述之，陈独秀的坚定支持者。他曾为当选过中共的第2号人物而沾沾自喜。他争议颇多，但对托洛茨基主义的信仰却始终忠诚不二
- 57 五、 托派统一代表大会是1931年的上海中国革命党人（不论是共产党或是托派）唯有的一次亮点，但这仅仅是星火一闪……

煉獄

一、
斯大林为了援助中国革命

而开设的**中山大学**，想不到却成了滋生

中国托洛茨基派的温床

1925年3月12日，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撒下了一个多灾多难的中国和奋斗不息的人民。

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前的那一刻，他拖着奄奄一息的病体，在一系列的文件上签了字。其中最有名的是汪精卫为他草拟的“总理遗嘱”，以及陈友仁为他草拟的“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封信。信的全文是这样的：

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

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借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

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

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绊。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

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

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孙逸仙（签字）

这是苏俄和中国革命党人的“蜜月时期”。然而中俄两国革命党人相亲相爱，共坠爱河却经过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辛亥革命爆发以后，1912年7月列宁在读了孙中山先生的《论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一文后，写下了《论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的长文，对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和孙中山先生表达了无限的敬意：

“这里的亚洲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这种精神和气概是这样一个阶级所固有的：这个阶级不是在衰落下去，而是在向上发展，它不是惧怕未来，而是相信未来，奋不顾身地为未来而斗争；它憎恨过去，善于抛弃死去了的窒息一切生命的腐朽东西，决不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而硬要保存和恢复过去的东西。

“西方资产阶级已经腐朽了……在亚洲却还有能够代表真实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亚洲这个

还能从事历史上进步事业的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或主要社会支柱是农民。”

可惜，在苦难与挫折中奋斗的孙中山先生还没有看到这样一位热忱和坚贞的朋友向他伸出的橄榄枝。在西方接受了近代文明和革命理想的孙中山，自然而然地将目光投向了西方。

1917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处在帝国主义列强重重包围之下的苏俄和他的伟大领袖列宁，再一次把目光投向了自已的近邻，投向了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提出了苏俄与中国革命党人联合的提议，再一次向他提出了求爱的信号。而此刻，在中国革命的泥淖里艰难跋涉的孙中山先生，在与西方列强无数次的打交道中都陷入了失败以后，也第一次将目光投向了苏俄。中国与苏俄的革命党人眉目传情，一拍即合。于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先生的牵线搭桥之下，1923年1月27日，俄共中央委员、苏俄政府代表越飞（以后因参加托派于1927年11月，在十月革命胜利十周年纪念大会以后，被斯大林开除出党。16日他在医院吞枪自杀），在上海莫利哀路（今香山路）上的孙中山先生寓所与孙中山会面，并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不久鲍罗廷将军来到广州，担任孙中山先生的顾问。1924年，国民党改组，改组后的国民党确立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两党合作，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就此产生。

在国共两党陷于内战的战乱年代，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污蔑中国共产党人是从苏联人手里“拿卢布”的。其实，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就是国民党，也都是“拿卢布”的，而且拿得远比共产党要多。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认为国共两党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革命党，因而对国共两党的支持都是无比巨大的。就已经解密的共产国际和前苏联的档案中得知，中国共产党从初创时期，一直到建国前夕，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确实十分巨大。

中共一大召开以后，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从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由中央机关支出17655元，收入国际捐款16655元，自行募捐1千元。”1923年10月，党的三大召开时，陈独秀在大会上公开承认：仅1923年前8个月，中共中央就“从共产国际领到经费约15000元。”而这个时候象工人运动的经费莫斯科还是通常单独支付的。比如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1923年5月笔记本上就记了这样几条：“今天北京转来2000.78英镑，其中三分之二用于组织中国的工人运动和劳动大会。”“1000美金，救济中国政府迫害的同志。”“额外1000金币帮助中国共产党”……

1924年中国共产党从共产国际得到的日常活动经费约36000元，以后逐月递增，到了1927年平均每月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经费已超过1万元。需要特别指出的，每年用于特殊事件的“特别费”，1927年以后，中共得到的超过几十万。比如1927年为了组织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共产国际特别拨款3万元——据说这是列宁格勒（即圣彼得堡）党员们贡献的一个

月特别党费。以后为了“秋收起义”拨款1万元；为了“广州起义”，拨款超过10万元……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对国民党经济上的支持更是数10倍于中国共产党。仅为了建立黄埔军校一项，第一次拨款就超过100万元，送来的枪炮子弹，5000吨的货轮装了满满一船。

1924年初，奉孙中山先生的指派，蒋介石在苏联考察时，孙中山先生特意给他发出了信函，在信中再三叮嘱：“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这番话是非常情真意切的。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俄国共产党和苏俄政府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俄共中央和俄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同时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在莫斯科建立一所以孙中山先生的名字命名的孙逸仙大学，俗称中山大学，专门招收中国学生，培养中国革命的干部。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一个选拔委员会，由国民党元老谭延恺、古应芬、汪精卫为委员，鲍罗廷将军任顾问。1925年10月7日，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66次全体会议上，鲍罗廷将军代表苏联政府正式宣布了这个决定，并提出第一批在中国招收了340位学生。其中，从广州招收180名学生，从在广州的黄埔、云南、湖南三所军校各招收10名学生，从京津地区和上海地区各招收50名学生，另有鲍罗廷将军特别推荐30名学生，总数为340名。消息一经传开，全国学生欢呼雀跃，其中绝大多数学生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或国民党员。鲍罗廷推荐的学生都是国民党上层人士的亲属，他

们中有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邵力子的儿子邵志刚，廖仲恺的儿子廖承志，李宗仁的妻子魏淑英、内弟魏允成，张发奎的弟弟张发明，邓演达的弟弟邓明秋，陈树人的儿子陈甫，叶楚伦的儿子叶楠，谷正伦将军的两个弟弟谷正纲和谷正鼎等。这里还有一件趣事：1926年秋天邵力子先生到苏联访问，也进了中山大学读书，于是出现了父子同学的场面。当时邵力子是个鳏夫，他看中了也在中山大学读书的共青团员傅学文，于是就娶她为妻，以后还将她带回了国内。当时中山大男女生比例失调，女学生总共不到60人。中山大学的男学生们看到一个老头子娶走了如花似玉的傅学文，只好在胸中暗暗郁闷。邵力子一贯左倾，1949年4月他在与中共谈判破裂后，与国民党决裂，留在了北平，这一切与他的“贤内助”不无关系。

蒋介石听到创办中山大学的消息，一方面将自己的年仅15岁的儿子蒋经国送去了学习，这是中山大学学生中年纪最小的学生。另一方面却严禁黄埔军校一、二期学生到中山大学去学习。因为这些人毕业在即，都是蒋介石军队中的骨干。但还是少数几个人悄悄的去到了莫斯科。其中最有名的是蒋介石的心腹、黄埔军校一期生邓文仪。此外，还有蒋介石集团的重要骨干康泽、郑介民等。

以后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在中山大学的势力，将在欧洲留学的一些中共党员送到了中山大学。这其中最有名的是邓小平。此外还有左权、傅钟等。邓小平也是在中山大学认识了漂亮的女共产党员张锡璠和她的妹妹张锡瑞。当时邓小平为23岁，张锡璠仅19岁，以后他们在上海结为了夫妻。

1925年10月，中山大学在莫斯科筹建完成。地址在莫斯科市中心的阿罗罕大街16号。这里是旧俄一个贵族的府邸，三层楼高，每间房间都高大宽敞，中间还有一个大厅，装饰着巨大的水晶吊灯，豪华气派。贵族时期是个舞厅，据说俄罗斯的著名诗人普希金和他的夫人就是在这里举行婚礼舞会的。

当时苏联人民的生活还非常困苦，但对在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却非常慷慨，为他们创造了非常优厚的生活条件。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

“当时的苏联，内战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创伤尚未完全恢复，但是，年轻的苏维埃国家对这些外国学生则尽全力给予了生活上和学习上的保障。苏联国内成立了中山劳动大学促进会，筹集办学经费。中山大学每年预算约为当时的一千万卢布，而且为了给外国学生们必要的外汇（例如回国费用），还需动用苏维埃政府本来就十分短缺的外汇。苏维埃政府尽一切可能保证学生生活。外国学生甚至享有优于俄国师生的生活待遇。有一位中国学生回忆道：“我们从未断缺过蛋、禽、鱼、肉，而这些在1926年是不容易搞到的。虽然经济困难，但一日三餐的数量和质量却相当高。我认为不会有什么富人的早餐比我们的更丰富了。”学校给学生发送西服、大衣、皮鞋、雨衣、冬装及一切生活用品，还设有门诊部为学生看病。学校组织学生观看芭蕾舞、歌剧等艺术演出，组织假期的疗养和夏令营，还组织参观莫斯科的名胜古迹和到列宁格勒参观旅行。父亲说过，他在1926年就曾随校去列宁格勒旅行。”

蒋经国在自己的回忆录《我在苏联的生活》一文中也曾写道：

“苏联人民自己虽然艰苦，对中国留学生却异常慷慨，刚开始，一日5餐，后改为一日3餐，早点一般是面包、奶油或牛奶，有时也有大米稀饭和小米粥，不吃奶油就给一个煎鸡蛋。中午每人一菜一汤一杯茶，汤里有牛肉、土豆、番茄。晚餐一大碗汤……主食白面包、黑面包都有，学生可随便吃。“我是个外国人，不花一个钱，在他们的国内吃得这样好，而他们自己的大学生，却这样艰苦。”

1925年11月，中山大学在著名的莫斯科工会大厦圆柱大厅里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工会大厦装饰一新，大厅中央挂着列宁和孙中山的画像，大厅两侧的墙上挂着俄中两国的国旗。开学典礼由中山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拉狄克主持。他是犹太人，1885年生于波兰，1904年加入社会革命党。他参加过十月革命，1918年德国革命爆发后，他潜入德国，作为俄共中央代表，改组德国工人党，是当时德国工人党的三位巨头之一，当卢森堡和李卜克西牺牲之后又回到苏联，专门从事中国问题的研究。他是一个学者，教授，是共产国际内首屈一指的中国问题专家，也是托洛茨基的战友和信徒。由于坚持托派立场，1927年底被撤去校长职务并开除出党，由米夫接替他担任校长。1942年拉狄克狱中被人打死——自然，这是后话。出席开学典礼的嘉宾众多，其中最著名的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

托洛茨基是十月革命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是俄共中央最重要的革命家和理论家中的一个，列宁的亲密战友。托洛茨基原名布朗斯坦，1879年11月7日出生在俄罗斯南部大草原一个犹太富商的家里，他17岁加入社会主义小组，接受马克思主义，2年以后逮捕，被沙皇政府送到西伯利亚流放，又过了4年他拿了一张署名托洛茨基的假护照逃出西伯利亚，来到伦敦，以后他便以托洛茨基的假名活跃在政治舞台上，而真名布朗斯基反倒被人遗忘了。

1902年10月他与列宁在伦敦共同创办了革命报纸《火花》，这也是他第一次见到列宁。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他在国外回到圣彼得堡，担任了圣彼得堡工人苏维埃的主要发言人。以后他几次被捕流放，又几次逃到国外。1917年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托洛茨基从美国赶回俄国参加革命，但不久又被克伦斯基政府逮捕，9月他从狱中释放，与斯维尔特洛夫等具体部署并领导了十月革命，并把列宁从芬兰湾畔接回到圣彼得堡。十月革命胜利的那个晚上，列宁和托洛茨基在等待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瞬间，是多么亲密无间地站在一起！托洛茨基在《自传》中回忆道：“我和列宁在会议厅旁边的一间小房间里休息。那里空荡荡的，只有几把椅子，不知谁给我们铺上了毯子，有人——大概是列宁的妹妹——给我们拿来的枕头。我们并排躺着，肉体 and 灵魂松弛下来，好象崩得过紧的弹簧一样。我们都睡不着，低声地交谈着：‘这是多么壮丽的画面啊！工人手执武器和士兵一起站在篝火旁。’列宁深有感触地一再重复：‘士兵和工人终于结合起来了！’”在十月革命

胜利一周年的时候，斯大林也撰文说：“起义的鼓舞者自始至终都是以列宁为首的党中央委员会。起义的全部实际工作都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的直接领导下的。可以肯定地说，卫戍部队之所以能转向苏维埃一方，……党首先要感谢托洛茨基同志。”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托洛茨基被任命为外交人民委员。1918年，他又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因而被称之为“红军之父”。他是列宁之后的第2号人物，他和列宁每天“都要在克里姆林宫的走廊里碰头十几次……讨论问题，交换意见”。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他是共产国际主义领导人之一，国际成立的宣言就是他起草的。他是一个宣传家，革命事业最热情的鼓动家；他是一个组织家，革命战争与革命军队最伟大的组织家。但他不是一个阴谋家，不会搞阴谋。于是在1924年1月列宁逝世以后，托洛茨基在与斯大林之间的权力斗争中明显占了下风！

托洛茨基口才很好，演讲起来极富感染力和煽动力。在开学典礼上，他向学生们描绘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好形势，鼓励他们学习革命——进攻——奋斗——不断进攻。从中山大学开学的那一天起，托洛茨基就在中国学生的心中播下了“托派”的种子和理想。

中国学生在中山大学的学习生活是非常紧张的。学生们课程众多，其中最受欢迎的是拉狄克讲授的“中国革命运动史”。他身材不高，相貌奇特，上额宽大，下巴狭小，口才雄辩而又风趣，表情和演说都会使人放声大笑。每逢他来讲授“中国革命运动史”，不仅中山大学，就连莫斯科东方大学

的中国学生都会赶来听课。满满的大厅里座无虚席。拉狄克滔滔不绝，旁征博引，感染了几乎所有的中国学生。以后中山大学成为中国托派的策源地，与拉狄克有极大的关系。

1927年，是中国革命大喜大悲、跌宕起伏、动荡十分剧烈的一年。由于中国革命的剧烈动荡，也影响了世界，影响了苏联，影响了本来就不平静的中山大学。

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并一举夺取了大上海，消息传出，群情振奋。这喜讯传到莫斯科，整个莫斯科都沸腾了。据以后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的盛忠亮（又名盛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中回忆道：

“中国革命军伟大胜利的消息象闪电一样迅速传播全世界。在中山大学，这个消息就象“晴空惊雷”。我们衷心欢呼，满怀喜悦和激情，互相握手和拥抱。我们无比激动，很多人的笑脸上流着晶莹的泪珠。

中山大学苏共党组织的书记走到一幅巨大的中国地图前面，鞠躬深切致敬。接着，他从图上标志军阀占领的上海的地方拔去小黑旗，撕得粉碎，扔到地上。我们都冲过去用脚踩它。几秒钟之内，这个旗子就给踩没了。在狂热庆祝的情绪之中，我们涌进大礼堂，举行了一个庆祝会。大厅中回荡着阵阵喧嚣声和大笑声。报告人的话一再地被震耳欲聋的喝彩声所淹没，几乎都讲不下去。我的一个同学跳上讲坛，尖声喊了一句“同志们”，毫不夸张地说，他由于无比激动而无法讲下去。他呆呆地站在那儿，由于狂喜笑得连话都说